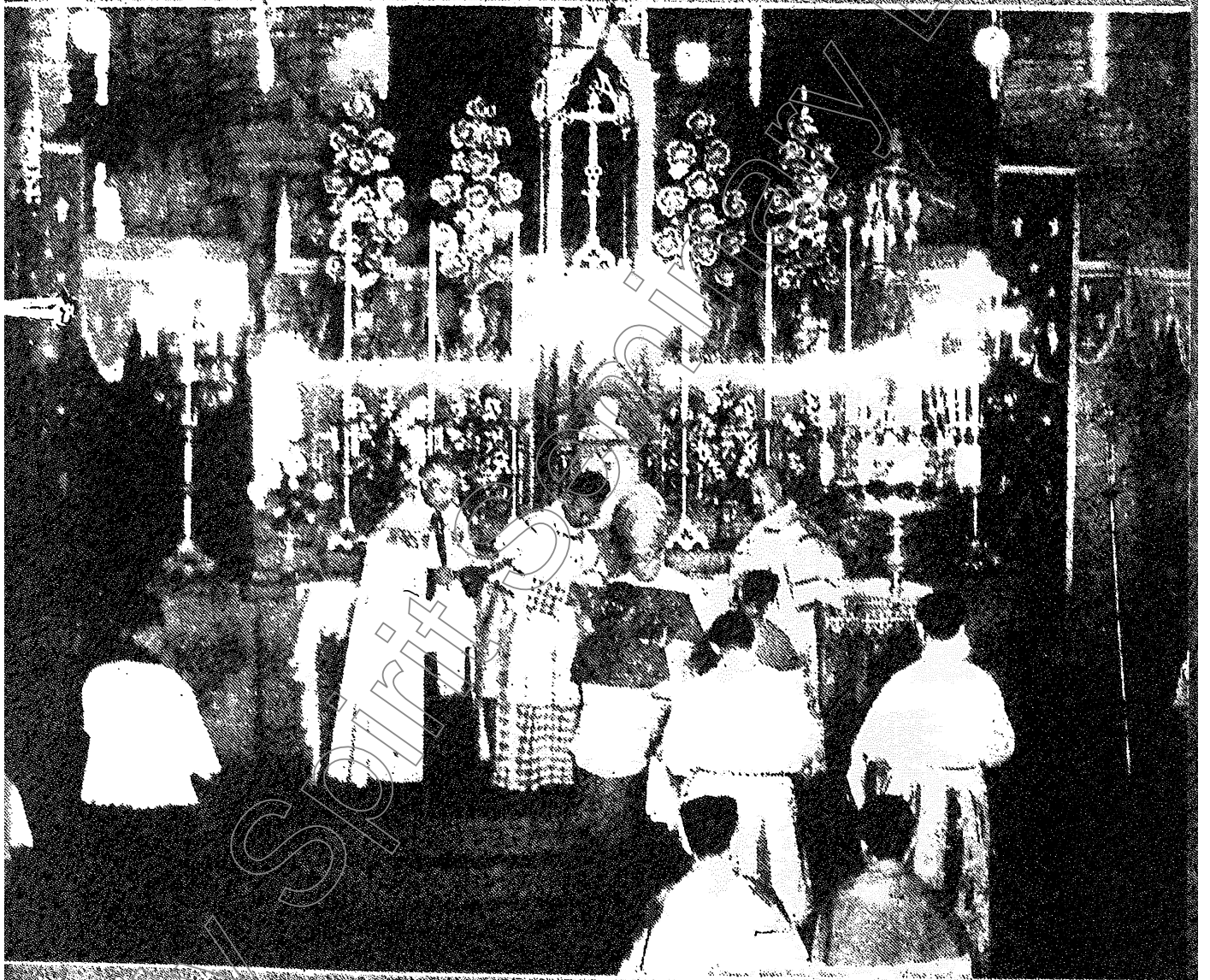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慶祝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





爲了慶祝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我國派遣了以毛澤東主席爲首的中國代表團到蘇聯參加慶祝典禮。毛主席和代表團團員一行，於11月2日上午乘噴氣式專機離開北京，途經伊爾庫次克和鄂木斯克，於當日下午3點20分（即北京時間下午8時20分）抵達莫斯科。到機歡迎的有蘇聯黨、政府和蘇聯最高蘇維埃負責人等多人。

圖爲毛澤東主席在莫斯科市郊西南30公里的伏努科夫機場下飛機後，與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熱烈握手。

新華社記者 侯波攝（傳真照片）

封面：東北皮漱石總主教於本年10月20日在沈陽教區總堂祝聖熱河教區張永慧、師若水二位司鐸。（詳見封底）



1957 年第 20 期 (總第 149 期) 目錄

半月談：愛國與愛教是一致的.....	(2)
中國天主教會與教廷的關係.....	張濟眾 (7)
我對上海教區張士琅代主教問題的看法.....	宋乐山 (14)
擁護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	王峻德 (21)
講道台：耶穌與人的結合.....	岳樹德 (24)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湖南省傳達會議進入討論階段.....	姚正一 (27)
廣州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委會進行傳達.....	(29)
各地傳達簡訊.....	(30)
濟南獻縣等地神長教友積極參加抗旱勞動.....	(31)
“四十年通牒”的反動政治本質.....	姚 溥 (32)
金蘋果.....	(35)
各地簡訊.....	(37)
耶穌傳.....	李德培 (39)

廣 播 (半月刊)

1957年第20期(總第149期)

1957年11月25日出版

定價：每冊1角

訂 閱 價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 个月 6 期 0.60 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6 个月 12 期 1.20 元
印 刷 者	(天津市新華區西寧道9號)	1 年 24 期 2.40 元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90號)	(國外及掛號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零售處付登配許可証第 40 號

愛國與愛教是一致的

我們的反帝愛國運動，是在愛國愛教可以統一起來，亦即愛國愛教的一致性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愛國與愛教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一個是政治性的問題，另一個是宗教性的問題。但是因為我們每個教友（神長當然也包括在內）都有兩重身份：一方面是國家的公民，另一方面是教會的成員；因而我們就有兩重義務：一方面是愛國——對國家盡義務，另一方面是愛教——對教會盡義務。因此，在每人的身上，這兩個問題就必須加以統一，使其一致。幾年來獲有輝煌成績的反帝愛國運動，也用事實回答了這個問題：愛國愛教是可以統一的。

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本來是容易理解的，既或一時認識不清的人，經過這幾年反帝愛國運動的實踐，也是完全可以解除任何疑慮的。但是為什麼有一些人還在這個問題上打圈子呢？不能不指出，這是受了帝國主義的毒素影響，是受了帝國主義分子及暗藏在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的蒙蔽或煽惑，而使一些人不能明辨是非。敵視新中國的羅馬教廷在其發出的所謂通諭中，就經常以“忠於天主，忠於教會”為名，煽動中國教友背叛祖國，反抗政府，叫我們“流血致命”，甚至以“絕罰”的手段迫害愛國神長。這是把愛國與愛教擺於敵對的地位，是十

分露骨的政治陰謀，同時，我們教會也確有那么一些甘心為帝國主義抬轎子的人，同樣以“愛教”為名，百般干預教友的愛國行動，為帝國主義効忠，這就不免使許多善良單純的教友糊塗起來，誤認為愛國愛教難以兼全了，甚而至於認為誰越不愛國，誰就是越有“聖德”，越值得“稱贊”。這裡應該指明：這種以宗教形式干涉我國內政的活動，是政治陰謀，是屬於敵我之間的矛盾的，因此我們就必須站穩立場，與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划清敵我界限，並且要耐心地教育那些思想受到毒害，蒙蔽的人，徹底認清愛國愛教的一致性。

我們的宗教虽然是救灵的事业，奉教人也确乎应该有恭敬天主以救灵魂的超性为头，但这只是一方面。因为无论如何，我們除了超性的生命以外，还有一个本性的存在；也就是說，我們除了要救灵魂以外，还以一个肉身需要照顧。肉身，和灵魂一样，是天主賦予我們的；同時，天主為了我們本性生活的利益，又給我們規定了許多誡命，天主十誡的后七誡全是以此為目的的。如果我們只務灵魂，不顧肉身；只做熱心工夫，不重視本性的生活；我們同樣不能救灵魂。這就是為什麼教會的道理把任何形式的自戕（如吸毒、酗酒等）都列為第五誡所不許，把侵害他人的正當權利的行為（如盜竊、欺詐等）都視為違反教規的罪惡。可見我們在过好超性生活之外，還必須盡好本性上的本分。而愛國一事，正是我們本性生活中的重要事項之一。

也許有人這樣想：愛國是應該的，但是愛社會主義新中國，擁護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有問題的，因為共產黨是不信神的，不愛社會主義國家是“為了教會的利益”。這種荒謬的想

法正是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的表现。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一贯在我们中间散布反共谬论。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想使我们相信：作为一个教友，不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要消灭教会”。如果我们相信了这种荒谬的说法，自然就会认为反对共产党，不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真是“爱教”的表现了。无如事实不是这样。已经在解放了的新中国的国土上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了八年多的中国神长教友，只要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应该已经能够充分地体验到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真实性；应该毫无保留地认识到共产党的目的是领导全国六亿人民共同建设祖国，谋求国家的富强康乐，而不是“消灭宗教”；因而也就应该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足以识破帝国主义者反动宣传是别有用心。那末，又有什么理由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把不爱国看成是“爱教”呢？

爱国是人民的天职，天主的诫命，同时也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因此，无论从教义上来看，或是从政治上来看，都是不应该逃避的。但是，我们中间仍有些人想用各种方法来逃避这种义务。有的人说：我们是奉教人，爱教就是爱国；也有的人说：爱国是应该的，但应该先爱教后爱国。这两种说法都似是而非，有加以批判的必要。

第一，所谓爱教就是爱国，实际上是想用爱教来代替爱国，也就是只爱教不爱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爱国与爱教虽然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虽然是一致的，但两者究竟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从历史上看，爱教也并不等于爱国，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庚子年间，除

了少数帝国主义分子和甘心为虎作倀的教会败类外，應該說是有許多教友是單純为了愛教而卷入了那場風波，甚至流血犧牲。結果如何？反而造成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借口，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生命財產的損失，这是愛國嗎？帝国主义分子組織反动組織“圣母軍”，有不少的教友是單純为了恭敬圣母，从愛教出发而被騙加入，成为帝国主义者破坏中国人民革命事業的工具。这也是愛國嗎？因此我們說：愛教不能代替愛國，必須在愛教之外還要愛國才是。

第二，所謂“先愛教后愛國”論者，動輒以“一欽崇一天主于万有之上”为护符，仿佛先愛了國就不是欽崇天主于万有之上了。这也是一种遁辭，国家和人民要求我們愛國，並沒有要求我們不欽崇天主于万有之上。我們在愛國的同时，照样可以坚信天主是造天地、造神人、造万物的真主宰，照样可以坚信天主是超越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真神。我們欽崇天主于万有之上，并不在于時間上的先后；更何況愛國本是天主的誠命，愛了國同时也就是欽崇了天主？愛國愛教既是一致的，自然應該同时并举；但在有些具体場合，愛國倒應該先走一步。这并不是把國家放在天主之上，而是因为愛了國才能更好地愛教。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國家仍如解放以前那样貧弱，受帝国主义列強的壓迫，成为帝国主义國家的半殖民地，罪惡橫行，惊心觸目，我們又如何能很好地熱心守規矩，恭敬天主？教友們養生贍死之不暇，日夜为生活愁苦奔波，又如何能尽好应尽的本分？如果我們沒有开展反帝愛國运动，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依然象过去那样把教會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我們又如何能象今天这样自由愉快地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教會又如

何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天主教更如何能在中国广扬？这些事实不是充分地说明必须以爱国为先决条件吗？

如果真象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先愛教后愛國，那也就等于說，國家如何先放在其次，先把教會搞好再說。不要說這樣根本达不到愛教的目的，就是形式上达到了，也許國家又要淪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那真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

是否对愛國不熱心的人是“聖德”的表現呢？恰恰相反，这样的人是不值得稱贊的，愛國愛教兼全的神長教友才是值得稱贊的，才是好的表率，才是我們的榜樣。古來很多列入聖品的聖人聖女，为达味聖王、聖婦尤弟德、聖女若翰納达克等等，都是既愛國又愛教的有聖德的先輩，他們的愛國事迹表現了他們超凡的聖德，因而为千秋万世所尊崇。今天，在我們的反帝愛國运动中，也湧現出不少的愛國愛教的神長教友。他們为祖國和教會的利益做出了許多令人景仰的貢獻，也為我們的後世子孫立下了芳表。如果說这些人不值得稱贊，而偏偏認為只有不熱心愛國的人有“聖德”，那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对愛國愛教的一致性的錯誤認識，当然不只这些。但不管还有多少，总之一句話，都是导源于对共产党不信任，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抵觸情緒的錯誤認識；而有这种錯誤認識的人，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則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思想毒害所致。我們希望，通过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传达和社会主义学习，这种錯誤認識能得到糾正；全國的神長教友，都能在这个有关愛國运动的根本問題上，获得一致的認識，从而都能放心大胆、毫無顧慮地积极参加愛國运动，在中国天主教友愛國會的統一領導下，勇往直前，奮力迈进！

中國天主教會與教廷的關係

天津教區神哲學院代理院長

張濟衆

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舉行，在天主教傳行中國的歷史上展開了新的一頁，使中國的教務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大會閉幕之後，全國各地的神長和教友們，都集中精神聽取大會情況的傳達；並為明辨是非，認識真理，陸續地展開了學習，認真地、實事求是地在討論、研究和分析。在討論中，我們遇上了一個重要問題，決定中國天主教前途命運的問題，一個從來不敢想和不敢談的問題，即是中國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的關係的問題。

有人說：“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開糟了！開會開的裂了教！”他們認為大會不應該討論與教廷關係的問題。我們認為我們與羅馬教廷的關係的問題，是實際存在的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因此，我們不應該神經過敏地把問題渲染成多

了不起，更不應該感情用事，抱有成見。我們要用冷靜的頭腦和理智來分辨是非曲直。我們說：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不是開糟了，而正是開好了；開得我們的政治覺悟提高了，開得我們的宗教信仰更鞏固了，開的我們在愛國愛教的基础上更團結了。大會使我們划清了界限，肯定了目標。我們是中國的公民，有責任愛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祖國；同時我們也是天主教友，也有義務愛我們的天主。祖國越富強，宗教生活越自由。相反地，如果國破家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們的宗教生活也一定要隨之而破產了。這說明了愛國愛教的一致性。

一身兼有天主教友和中國公民兩重身份的我們，和羅馬教廷還保持着密切的關係，這是天主教和其宗教不同之點。今天要弄清的，也

就是这一点。一方面我们要和罗马教廷保持着关系，作个虔诚的教友；一方面爱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作个好公民。现在仅把我在学习当中的初步认识写在下面，希望大家指教。

從宗教信仰上看羅馬教廷

羅馬教廷是全世界天主教的最高領導，那里有圣教会的元首——教宗。根据圣教法典218条第1款：“羅馬教宗为圣伯多祿首任教宗之繼位者，不但有最高等級之榮譽，而且对于天主教会之全体，有关于信德及道德，全世界天主教会之紀律和行政，有最高及完全管理权。”按照这个規定，教宗的权力不出乎有关教义的范围。教宗权包括七項：其中以“司訓权(Potestas docendi)”和“管理权(Potestas regendi)”为最重要。司訓权标志着“教宗不能錯誤”的道理；管理权标志着教宗对教会的統治。教宗的这两种“优越权”，不但是名譽的，而实在是实际的，是基督指定的。教宗虽然占主教們之首位，但不能剝夺主教权；因为宗徒們之权直接受自基督，非受自伯多祿，但基督欲使他們在伯多祿的領導之下，行使此

权。主教們都是宗徒們的繼位者，因此，主教們的权，亦非來自教宗，而是他們在被祝圣主教之时，借神品圣事，由天主之手得來的。他們只是在教宗——伯多祿的繼位者教宗领导下，执行他們的职权。

我們时常听到“教宗不能錯誤”这句话。这并不是他个人不能錯誤，而是說明他和不能錯誤的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基督許下了教会：

“我与你們日日相偕，直至世界末日。”(瑪，二十八，20)又說：

“我父因着我的名，要派來的那位援助者圣神，將要指教你們，使你們記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若，十四，26)教宗和我們一样，也是个人，既是人就会錯誤的。

神学上有句話：“人是会錯誤的(Errare humanum est)。”因此，不能說教宗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錯誤。这不是圣教会的道理。教宗是教会的領導者，有他不能錯誤的条件：

(1) 教宗根据他宗座的职位，以宗座的“优越权”決定某項当信当行的道理；

(2) 教宗根据圣伯多祿的最高司訓权，执行他教会元首的任务，教訓全世界的信徒，而不是以羅馬城主教或梵蒂岡国国王的名义

发出言論；

(3) 教宗定断当信当行的道理，应有绝对自由，不受任何势力所强迫（包括武力、威脅、恫吓、引誘等等卑陋手段）；

(4) 教宗所决定是有关信德及道德的，包括在启示范圍之內的（聖經聖傳），或与启示有密切相关的部分，即有关教义与神修的道理。除此以外，象国家政治、經濟、文化、科学、工程、建筑、社会制度，不在启示之內。教宗对这些是会錯誤的。

“教宗不能錯誤”曾被許多人誤解了，認為他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明若觀火，断事如神，簡直把教宗看成是全知的，圣善无过的了。这是不对的。因为只有天主才有各样美德，教宗既不是天主，不可能有諸般美德。例如在1500年左右，历史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几位教宗，如亞立山大6世、犹留6世、良10世的时候，从表面看来，宗座的榮耀达到了极点，但觀其內在的精神，已陷入了墮落最深的黑暗深淵。尤其亞立山大6世，曾被称为最羞辱教宗位的和极无道德的人。因为他把他的生活和事业都叫一个名叫波耳查（Borgia）的来掌握。

自从首任教宗伯多祿以迄現在的比約12世，267位教宗之中，列入圣品的和傑出的人物固然不乏其人；但那39位“伪教宗”，不能否認是教宗史上的污点。这样看来，凡是一位虔誠的基督信仰者，又怎能說他們是不能錯的呢？又怎能說“抗議教宗便是裂教，于良心不平安”，和什么“应当服从他，跟着他走，走錯了，也情甘願意”呢？良12世說过：“研究历史，即不主張非真理。”所以我們不能掩飾教宗史上的污点，肯定地認為教宗永不能錯。

教宗在不能錯时，也是因为他因启示与默感获得了真理，而不是因为他有超人的特长、絕頂聰明和特殊圣德。教宗的不能錯，是因为天主圣神的助佑，但这种助佑，并不能把他高举到超越人的範圍之上；而是在他遇到极大困难与应負重大責任的时候，得到天主的支持与扶助，可以說有天主的力量使易于錯誤的人堪作基督不能錯誤的代表。其目的，是为了保証聖經聖傳的本質完整如初，不失原意，使教会成为至一、至圣、圣公，从宗徒傳下来的基督立的圣教会。

教宗对教会的管理权（即行政权）是由基督交給了首任教宗伯多

祿和繼他位的后任教宗們，這是信德的道理。因為基督向伯多祿說過：“你敢牧我的小羊和大羊。”又說：“我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你在地赦免的，我在天也赦免；你在地不赦免的，我在天也不赦免。”梵蒂岡公議會對此也作過決議：

“凡不承認教宗對教會有管理權者，被開除通功。”凡是信仰天主教的人，沒有不承認這一條當信的道理的。但是，在執行時授與和撤銷，給這人和不給這人，就不是當信的道理了。因為凡是件“當信的”道理，是不会有差錯的；有差錯的，就不是以“當信的”道理看待。如果我們一定要說教宗授與和撤銷權力也是“當信的”道理，是不会差錯的，那末歷史上多次證明的，不但教宗個人，就連領導主教們施行此權時，出了不可彌補的偏差，又如何解釋呢？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硬把中國東北土地強佔，成立了“滿洲國”。教宗對中國東北各省教區的管理，發出了命令，委派帝國主義分子高德惠在“滿洲國”當了他的代表。凡主持正義的人都說教宗這樣的對教會管理有了差錯。日本侵華時，在正定教區燒死了連主教在內的共8位神職人員，在滄縣城內殺死

了獻縣教區的近40位神父，但是，事過之後，教宗和日本互換大使，發生了親密的來往。這些對教會管理上的偏差，能說是當信的道理嗎？

我們認為，宗座對教會享有管理權是理當的，這是基督委派伯多祿充任教宗的主要動機，很顯明教會組織秩序的安定，有賴行政上的管理；換言之，管理教會是為了信徒們公共利益。如果這種管理是給信徒們招來損失，這就是差錯。最近教宗對上海教區的管理，就出了偏差。因為他否認了張士琅代理主教的合法地位，硬把特權分給“和平通功”者，亦即反動的神父們。這無疑要分裂教區，使神父們各自為政，使信徒們無所適從，造成了混亂現象。這種不合理的相反基督聖意的管理方法，不能不激起全中國三百万教友的嚴重抗議。有人說：“張士琅應當接受教宗的不合法的管理。”說這樣話的人是無原則地支持了教宗在管理上的錯誤。我認為，張士琅代主教，為了上海教區的全体教友們的利益，整個教區的利益，傳揚基督福音的利益，救人靈魂的利益，應當負起責任來，因為這些利益就是天主的意旨。宁可聽天主的意旨，不能聽人

的不合理的处理。这是真理。誰否認这个真理，就否認了天主为人定的救灵魂的自然律。

從政治立場上看梵蒂岡

梵蒂岡是位于意大利首都羅馬城境內的一个幅員不大的国家，是于1929年，經天主教的元首——教宗比約11世和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开了300多次的特別會議而成立的国家。这个国家佔地約40公頃，公民約有千人。在这国家里設有天主教会的領導总机构——教廷并駐天主教会的元首——教宗。

梵蒂岡有它自己的軍隊和宪兵，自己的貨幣、邮电、广播、通訊社、报纸、刊物等。它还有自己的外交、政治、經濟和国家制度等。

梵蒂岡作为一个国家來說，起的作用不是很大的。但是从梵蒂岡作为整个天主教——宗教組織中心的角度来看，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因为梵蒂岡又是个国家，又是个世界天主教会的領導者，政权与教权都操在教宗一人之手。这种兩重身分的影响是不可忽視的。

梵蒂岡大約在60个国家里駐有大使和代表，和40个国家发生了外

交关系。美帝国主义虽因宪法規定不能和它互派使节，但是偷梁换柱地派总统私人代表常川駐在梵蒂岡，更易于互相交換意見。梵蒂岡駐外使节常居使节团的首席，礼仪优渥，是另有用意的。

众所周知，帝国主义为了侵略別的国家 and 干涉別的内政，不惜利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方法，特別利用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因为其他宗教不象天主教的組織有系統。天主教会的組織是由上而下的层层节制。这个严密的有系統的組織对于帝国主义利用有很大便利。他們費尽心血，絞尽腦汁，要把这个中心抓在手里，以便通过它向世界上各国的天主教会进行阴谋活动。有着强烈的宗教感情的教友们，如果不分清政治与宗教，很容易是非不明，盲目服从，認為凡出自教宗之口的都是属于宗教信仰範圍內的事情，感到遇事不听教宗，于心不安。这样，就使帝国主义利用梵蒂岡进行政治活動成为可能的了。

中國天主教與羅馬教廷的關係

既然帝国主义慣于利用天主教

进行政治活動，我們就必須弄清中国天主教与羅馬教廷的关系。我們說：除了在不信不行的教义教規上絕對服从教宗之外，在政治、經濟上，我們必須和它割断关系。梵蒂岡在政治上走的是帝国主义的政治路綫，那它自己走好了，决不應該强迫我們也跟着它走。我們虽然是天主教友，但也是中国公民，不能因为信仰天主教就变成了梵蒂岡国的公民。我們在政治上走的是由中国共产党領導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在政治立場上，我們和梵蒂岡是背道而馳的。我們不許可教廷利用宗教形式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来干涉我国內政。我們也不應該因为信仰宗教，而接受教廷的政治命令。因为，“責撒肋的，归于責撒肋；天主的，归于天主。”（瑪，二十二，21）“應該向誰納稅，就向誰納稅；應該向誰納捐，就向誰納捐；應該畏懼誰，就畏懼誰；應該尊重誰，就尊重誰。”（罗，十三，7）“我的国不是从这世界来的；如果是从这世界来的，我的士兵当然要用武力抵抗，决不会使我解送給犹太人。可見我的国不是从这地上来的。”（若，十八，36）基督和圣保祿的这些话已經為我們划清

了教义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說，在純宗教教义上應該服从教宗的領導，在国家政治上應該服从政府領導。

教廷在政治上是一貫反苏、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它發給我們中国天主教会的命令，我們首先应当分析是否是純教义的。中国解放以后，教廷曾向中国天主教会下过好几道命令：禁止我們爱共产党領導的国家，說“爱国有罪”，給爱国的神长摘掉神权等等。請看！我們是中国人民，而教廷不許可我們爱中国，这怎样办？我們能够接受这种反动命令嗎？有人說了：“不听教宗命令，是背教，裂教。”如果我們听呢，尽管不是“背教”“裂教”了，但却是叛国了。三百多万的中国神长和教友听了教宗的命令，不爱国，行不行？六亿人民能容忍嗎？再說，我們奉的是天主教，而不是帝国主义的教。天主為我們頒了十誡，命我們爱国，聖經上也命我們爱国；而教宗不讓我們爱国，难道教宗的命令能超过天主的命令嗎？

有人說了：“教廷来的絕罰，即便不合理，我們为了怕給別人立坏表样，在表面上必須接受。”这

更是顛倒黑白的說法。法典明文規定，“無罪就沒有罰。”沒有罪，而接受罰，在別人看來必定認為是有罪的，不然，必不接受罰。因此，接受了罰才正是壞了表樣。如因為愛國而接受了罰，不但為個人壞了表樣，有了損失，而且給中國三百万教友和神長們壞了表樣。原因是：大家一致認為愛國是我們每個人的天職，是守了十誡，是個美德；如果接受了因愛國而招來的不合理的罰，豈不是使人誤認為愛國是有罪了嗎？因此，對不合理的罰，我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中國教會必須獨立自主

此外，再談一談中國教會獨立自主的問題。1946年，教廷宣佈了中國天主教會實行聖統制。消息傳來，真使萬眾騰歡，額手稱慶。但是聖統制的實質在哪裡？在宣佈聖統制前，各個教區由帝國主義分子任主教；宣佈聖統制之後，還是他們當主教。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聖統制，”實際上只起了助長帝國主義分子們的氣焰的作用。天津的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就說過：“這下子，再不能換我了。”難道我們中國的天主教會的半殖民地狀

態，就永遠這樣下去了嗎？這是不合理的。尤其是中國解放以後，國家已一躍而為世界上的大國之一，國際地位空前地提高了，我們教會的半殖民地狀態也應該隨之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所要求的是，中國天主教會應當和其他獨立國家的天主教會一樣，享受應有的獨立自主的權利。這不是過份的，而是合理合法的。教宗本篤15世在“夫至大”通牒上嚴厲責斥了帝國主義分子們阻擋中國天主教會自辦，今天這些阻力在中國已經絕跡，為什麼教廷對中國教會的自辦問題，還遲遲不決？難道這還不夠說明教廷敵視新中國的政治態度嗎？

中國教會必須獨立自主，必須擺脫過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中國教會與教廷可以有純宗教上的聯繫，但決不容許教廷利用這種聯繫來達到它的反動政治目的。這是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的精神之一，也是我們全國神長教友應舉全力以赴的當前急務。

☆ ☆ ☆

我對上海教區張士琅代主教問題的看法

天津教區神哲學院教授

• 宋樂山 •

全國神長教友所盼望的全國性的愛國組織，通過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召開，業已組成。全國性的愛國會，將促使愛國愛教的工作進一步地開展，順利地推廣愛主教人的傳教事業。這個目的是有利於國家與教會的；所以在會議進行期間，全國各地的神長教友莫不對會議寄以無限的關心和熱烈的期望。

愛國本是天主的誠命、人民的天職，本來沒有什麼可以疑難的。但是由於今天世界上存在着兩種不同類型的國家，由於教會過去所受的帝國主義影響以及今天羅馬教廷在政治上的態度，遂使這個問題複雜化了。愛什麼樣的國？能不能擁護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這些問題在這次大會上都經過了討論，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因為我們是中國的人民，同時也是根據我們教義的精神，我們應該愛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而是由共產黨領導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新

中國。不但如此，對我們每一個中國教友來說，在愛國的責任上，還必須加上一個反帝的責任。這是因為教會過去的確曾為帝國主義者利用為侵略中國的工具，歷史事實俱在。如果我們沒有盡到反帝的責任，那就是我們沒有盡好愛國的責任。

在這次會議中，曾出現許多謬論，但經大家擺事實、講道理，這些謬論已被駁倒，大會的決議經全體代表一致舉手通過。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全國的神長教友對於決議的精神都能很好地領會，思想中都已沒有問題了。恰恰相反。據我所知，有的人對於這次大會所討論並已作出決議的問題，還有的搞不通。尤其對於上海教區張士琅代主教的問題，更有許多似是而非的議論，比如有人說：“我們的教會是有隸屬關係的，神權是由上而下授與的。神父的神權是主教給的，主教的神權是由教宗來的。今天教宗

既不給張士琅神權，那末他的神權又从哪里來？”說這樣話的人也承認教宗無理否認張士琅代主教的措施是不正確的，但是，“正確也罷，不正確也罷，他既撤銷了你的神權，你就失掉了你的神權。”還有的人擔心這樣會“裂教”。現在我把我的看法說出來，供大家指正。

從政治角度來看問題

關於張士琅代主教的問題，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它的本質，問題就清楚了。這個問題表面上是屬於教義教規方面的問題，但實質上却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是純教義教規的問題，當然可以用神學、法典來考慮；但是這是政治問題，所以如果只用神學、法典來考慮，那就不對頭了。為了照顧一個教區的利益，教宗有權把管理權授與某一位神父，或不授與某一位神父；但是如果教宗這樣做不是為了教區的利益，而是為了達到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那末這種權柄就大大地可疑了。

近來，我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教宗的政治面貌。教宗是一身兼二職的：梵蒂岡的元首及全世

界天主教會的最高元首。梵蒂岡既是一個國家，當然有它的政治路線。事實證明，梵蒂岡的政治路線是資本主義的路線，是與社會主義相敵對的。梵蒂岡一貫反蘇、反共、反對社會主義，有時採用公開的政治的形式，如贊成北大西洋公約、馬歇爾計劃，支持匈牙利反革命暴亂，破壞中國的解放事業，把黎培里命為駐台灣蔣介石集團的“公使”等；有時則採用不那麼公開的形式或是通過宗教形式來達到政治目的，如李維光代主教、李蔭桃神父，就是因為他們愛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而被教廷用宗教形式“絕罰”了。張士琅代主教的問題也是如此。張士琅代主教的當選，完全是按照法典的規定、合法的程序產生的，他的當選是合法的，也是完全合乎上海教區14萬多教友的利益的。假設教宗真是以上海教區的利益為念，誠心照顧上海教區14萬多教友的神益，那他就沒有理由不批准張士琅代主教的合法當選。他如今就不批准，反而提出亘古未聞的辦法——授權給“和平通功”者，其中的原因，是再明顯不過了。他為什麼這樣做？就是因為張士琅代主教沒有象龔品梅等人那樣地反對政

府，反而在爱国的事业上有了积极的表現，不象龔品梅那样“称职”。所以对張士琅代主教的問題，我們應該認識到这是羅馬教廷以宗教的形式，通过不批准他为代理主教，来打击爱国的神长教友，破坏我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完全是政治迫害，是政治阴谋手段。它虽然是以宗教形式出現的，但很明显不是宗教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因此，如果我們單純用神学、法典的观点来看这个問題，那是不合乎实际的。

教权与政权是两个不同的权柄，各有各的范围，互不相扰。政权不能干涉教权，教权不能参与政治。政权不能授神权給某某人，那是无效的；教权也不能用教会的命令干涉政治，那也是无效。正是因为这种关系，張士琅代主教才挺身而出，良心很平安地向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活动表示抗議。他在大会上发言說：“为上海教区的利益，就是十几万靈魂的利益，坚决担任上海教区的领导，願竭尽所能，不怕任何困难……”又說：“这种措施显然已經不是宗教問題，而是通过宗教方式来干涉我們的內政，要把一項‘特权’，授予忠实执行梵蒂岡反动政策的人，引誘我們上海神职人

員和教友来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走龔品梅过去的反革命老路，把教会陷于絕境，……使我們背叛祖国，違反天主的誠命。我不能接受这个反动政治的命令……”，“我相信我們的斗争是正义的……。”張士琅代主教表示了他的严正的态度，得到了全体代表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全国爱国爱教的神职和教友的支持。

張士琅代主教的問題，不是一个区域性的問題，而是一个全国性的問題。事实很明显，羅馬教廷要我們走反共的政治路綫，甚至不惜牺牲整个中国教会的利益，也要我們反共到底。它要我們“流血致命”，我們說，那不是致命。如果說不反对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灵魂就不能得救，倒是在神学道理上找不到一些根据的。在不違反我們的信仰、不違反天主的誠命和本性律的条件下，我們能够也应当跟共产党合作，承認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誰若再把“唯物、唯心，信神、不信神”的問題再搬出来，是絕對蒙蔽不了已經覺醒了的神长教友的。

对張士琅代主教的爱国表現，我們是贊成的，支持的。为了爭取

爱国的权利，为了上海十多万教友的利益，为了争取中国天主教会独立自主的权利，我們贊同大会对羅馬教廷的抗議。这是在政治方面的抗議，妨碍不着我們在教义方面对教宗的服从。这是說理，争政治的权利，不是什么“裂教”。对教廷的抗議，正是表現我們跟教宗保持联系，如果我們要“裂教”，根本就用不着抗議了。至于所謂“教宗撤銷了你的神权，你就失掉了你的神权”的說法，更是不值一駁的。前面已經說过，教权有它的范围，超越这个范围，它即已失效。教廷用宗教的形式达到政治目的，就是已經超出了它的权限范围，更有什
么“失掉神权”之可言呢？

從教義教規角度來看問題

除上述理由以外，我們也可以用教会的神学道理来分析一下这个問題。我个人有几点看法，提出来，請大家多指正。

(1) 首先应当把教会的神权的种类明确一下：我們教会的神权有兩種：一是“神品权” (potestas ordinis)，一是“管理权” (potestas jurisdictionis)。這兩种权有时我們統称之为“神权”。

头一种“神品权”是有神印的，一次有了这个神品权，永远就有了，也是永远去不掉的 (“tu es sacerdos in aeternum”) 所以是絕對的，也就是說，它不承認任何特殊情况。第二种是“管理权”，它是沒有神印的，所以也不是絕對的，也就是說，有这种神权了，也可以去掉，那沒有这种神权的 (当然只限于神品人員)，遇到特殊情况，不通过上級的授与，也能有了这种神权。再談这两种神权的授与問題。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两种神权都需要由有关上級来授与，同时头一种神品权，不承認什么正常或非常的情况，是絕對的，应当由有关上級来授与，若是上級不直接授与，在任何非常的情况下，也是不能有这种神权的。对第二种管理神权，就有些不同了。在正常的情况下，也是由有关上級来授与，但是它承認非常情况，也就是說，在某种非常情况下，虽未通过上級的直接授与，也能有这种神权。比如病人临危时，任何一个有神品权的神父，虽然他没有正常的管理神权，都能給病人听神功行圣事，这是神学家們都公認的。这种特殊神权，在神学上有一特殊名称，叫作“圣

教會給補充的神權 (jurisdictio quam supplet Ecclesia)。从这个名詞的字义来看，这种特殊神權似乎还是圣教會來授与，來給補充。但是从此特殊(緊急)情况的本質来分析，这种特殊神權直接来自基督的圣意，而圣教會在此情况下也仅仅是作一个解釋工作。簡言之，这种特殊神權不是圣教會授与，而是直接由天主授与，不是“de jure ecclesiastico”而是“de jure divino”或“naturali”。也就是說，圣教會在此情况下不能隨便授与或不授与，它仅仅是通知你肯定有此神權。

今天所討論的張士琅代主教的的神權問題，显然不是头一种神權問題，而是第二种管理神權問題。因为它不是絕對的，那我們就有討論它的可能性。張士琅代主教的情况比起上述的临危病人的情况，只有更为緊急而无不及的。因为上海14万多教友因失去領導而限于混乱，其情况之严重远远超过一个临危的病人。14万多教友的靈魂的利益，就是14万多教友的权利要求有一个領導，而这种权利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會的最高領導的責任只有照顧、謀求和保护教徒的这种权

利，而不是剝奪这种权利。我們說剝奪也是无效的，因为这是“de jure divino”（来自天主的）。

(2.) 張士琅代主教的的管理神權，通过按法典的程序而被中选，是肯定下来了，張士琅代主教有了神權。今天教宗推翻法典，否認取消他这个神權，这是張士琅代主教問題的客观情况。問題就是：教宗能不能撤銷他的既得神權？对張士琅代主教取消了既得神權以后，張是不是还有这种神權？問題倒是新的，亘古未聞的。我們若是答說：教宗有撤銷張士琅代主教的既得神權的最高权柄，張士琅代主教的既得神權既是被教宗取消，那么張也就失掉了他的既得神權，这样的答案倒不是新鮮的，倒不是亘古未聞的，倒是很自然的。因为教宗是超法典的，同时又是最高的立法的，这是任何一个信徒不能否認的，因此更加說明上边肯定的答案是很自然的了。但是我們的答案不是这样的肯定的答案，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們說，对張士琅代主教的問題，教宗是不能取消他的既得神權的，即是取消也是无效的。我們提出这样否定的答案，是在不失去我們的信仰，不否認教宗是最高立法者，

同时还是在教規教义上对教宗保持我們的最高尊敬和絕對的服从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我們認為这也不是矛盾的。我們承認教宗是超法典的，但是我們說也不能越乎人情和理性而超法典。立法超法都必須以具体教会的利益为根据。建立某某法条是为了具体或整体教会的利益。取消法典的某一条，也必須是整体或具体的教会的利益有所要求才能有效。也就是說，立法者不能随便的就立，超法典者也不能随便的就超。上层还有人情、理性、教会的利益；也就是說，还有基督的圣意为限制。結合到撤銷張士琅代主教的既得神权的問題，也必須以上述的原則来解釋。教宗委任或撤銷某教区的主教，也必須是有他的条件的。根据法典神学博士們的解釋（如 Vermersch、Bouix 等等）：教宗委任某主教，或撤銷某主教的职权必須有兩個条件，那就是：确切正当的理由和具体教会的利益（*Justa de causa et utilitas ecclesiae concretae*），二者缺一即无效。針對上海問題，我們說這兩個条件都不存在。第一沒有正当的理由，同时所根据的理由是沒有事实根据的。說什么張士琅代

主教的被选是“不自由”的，是在“爱国的人民委员会中”被选的，那完全是凭空的設想，因此撤职的理由是不存在的，因而撤职是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判決則无效（*Causa falsa, sententia nulla*）”这是法学博士們的說法，也是有理論和历史的根据的。第二，沒有照顧到具体上海教会的利益。这一点在我們看来是很明显的。如上边已說过，上海14万多教友的灵魂失去照顧和明确的領導，教区陷于混乱状态。所說的“和平通功”者，又是离奇透頂、不顧现实的一种措施。那么我們說教宗撤銷張士琅代主教的的神权无效，張士琅代主教仍然有他的既得的管理神权，也是有神学法典上的根据的。

有人或者說：“教宗对处理張士琅的問題，不能說他沒有他的正当理由，也不能說教宗不願照顧上海教友的利益，教宗有他的（他沒有責任宣佈的）正当的理由，同时他这样作正是照顧了上海教友的利益。”我願意在原則上同意这种說法，因为这种說法反映了起碼在原則上，我們还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这种說法也承認教宗撤銷張士琅代主教的的神权，必須有上述兩個

条件：正当的理由和上海教区的利益。那么问题所有的出入，仅仅在于对客观实际的看法问题了。什么是正当的理由？怎样才算照顾到上海教友的利益？对客观实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在教宗看来撤销张士琅代主教的神权也许有他的“正当的理由”。因为教宗把新中国的政权和解放事业看成了是“特殊情况”，是“非常时期”，是“过渡时期”。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情况是要“正常化”的，因此他对中国的教务采取了非常措施：五、六年来未曾给中国圣一位主教，对上海教区又发明了什么“和平通功”，这不都是非常措施吗？这是教宗的看法。对同一的客观实际，我

们的看法不是这样的。我们把祖国的解放事业看成是正常的情况，是正常时期，是永久稳固的。

我们认为教宗所根据的“正当的理由”实际上是不正当的、不真实的。理由既不正当、不真实，由此理由出发而作出的判断当然也是不合理的、无效的，不能接受的。同时，这种错误的措施实际上不但没有照顾上海教区的利益，反而会使上海教区陷于混乱，当然更是不能接受的了。

总之，我认为，无论从政治上或从宗教上来看，教宗的这种措施都是难以接受的。北京大会对教廷提出了严正的抗议，是有理由的。我绝对拥护。

老河口方濟各三會修女發願銀慶

今年是湖北老河口教区圣母无玷圣心方济各第三会修女王洁冰、罗正德、杨庆浩三人发愿25周年纪念。三位修女在老河口教区总堂，当襄阳教区主教易宣化前，光荣举行了复愿典礼；并在老河口教区十余位神长和20位同会修女庆祝声中，举行了发愿谢主银庆纪念。

三位修女举行的发愿谢主典礼，是解放后首次隆重扩大庆祝的典礼，特别得到人民政府协助和支持。这是更值得感激不忘的。

（施润民）

擁護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

天津崇德堂神父 王峻德

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莊嚴地通過了決議，號召我們擁護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羅馬教廷利用宗教形式進行反動政治陰謀，以及中國天主教會獨立自主等，其意義至為重大。我特將以上問題，綜合成兩點，約略地談談我個人的認識，這也許為幫助我們澄清混亂思想有所補益。

一、關於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我們教友站在公民的立場上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成問題的，也不會有甚么可與不可的爭論。可是我們又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教友，從信仰的角度，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是否有問題呢？在教友中間，這還是個比較普遍的問題。既有混亂思想存在，就要加以

澄清，辨明大是大非。

有的教友說，我們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在北京大會上，就有人這樣說過。他們的意思是說，社會主義制度與我們的教義不合。還有人說：社會主義制度與聖教會的道理完全符合。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不正確。第一種人認為，社會主義是由共產黨領導的，而共產黨不信神，不信神與信神的是兩個相對的立場，因而教友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我認為這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共產黨不信神，這是事實。但另一個事實還證明：共產黨並不因它不信神而阻撓別人去信神。毛主席向西藏致敬團講話時說：“共產黨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和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採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採取保護政策。”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的各國代表面前說過，信神的和不信神的可以“求同存異”。故此，信神的與不信神的不能團結合作的論調是錯誤的。

不久以前，我曾到過獻縣，並去過許多堂口，沒見一點不自由的地方；神長教友打成一片，非常愉快。他們的宗教活動受到政府的

保护。有一次，修女們在学习期間，要举行发願的仪式，政府送去猪肉、白面等賀礼。从这些方面看，說信教的人不能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不对的。

另一种人說：社会主义制度与圣教会教义教規完全符合。我認为也不必这么強調，应该实事求是地說：它們不完全吻合，但这并不妨碍我們作教友的拥护政府，因为自从有史以来，从没有过一个政治制度与教会的教义教規是完全吻合的。圣教会的道理，虽有些地方与社会主义不尽相符，但不能因着那一点就不爱我們的祖国。在私人之上，还有政权，政权有权柄把土地、财产分給大家，或者收归国有，教义承認这一点。在私有制底下会产生剝削、压迫，政府因着取消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了剝削、压迫，人人都平等了，这与我們的教規教义是相符合的，因此我們欢迎，我們也应该拥护社会主义的国家。

回想过去掌握政权的，为国家究竟做了多少好事呢？有过甚么建树？重工业一点也談不到，甚至连自行車都不会造。而现在的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几年来的发

展非常迅速。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鋼的年产量达到500多万吨，而第二个五年計劃中，鋼的年产量要提高到1000多万吨！这也是我們应当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参加社会主义建設的理由之一。再看现在的社会道德，也与过去不同了，一切伤风败俗的罪惡場所都没有了，我們怎能不爱这个国家呢？

二、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

教友們最关心的、最大的問題，恐怕要算是与羅馬教廷关系問題了。过去，好多神长、教友，不願意談这方面的問題。可是，不談并不等于問題已經解决。問題来了，不談也得談，是迴避不开的。

我們从小念要理时就說，誰是圣教会的首？答：看不見的是吾主耶穌，看得見的是接伯多祿位的教宗。也正因此，我們要在教义教規上百分之百地服从他的領導。但为什么北京大会要向他提出抗議呢？我們說，在教义教規上該服从他的領導，不然就是裂教；但不是說在一切問題上都要服从他的領導。北京大会抗議的是他的政治方面。因为教宗有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場，羅馬教宗同时也是梵蒂岡国元首，每

一个国家都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梵蒂冈也不例外。近年来，教廷在纯教义上的指示，如圣母年，空心斋，复活节变更礼仪等问题，我们都百分之百地服从了。然而，他若在政治方面也叫我们服从，我们就不能服从，因为我们不是梵蒂冈国的公民。这里不妨举个简单的比方，比方政府号召我去修长江大桥，我去；叫我去参加某项建设，我也去。但政府若说，王神父，你到某处给谁去行终傅，行坚振，我不去。因为那事情已超出了政府的职权范围，虽然是政府命令我，我也不服从。教宗也是如此，他的职权是叫人行圣事，若叫我们去反对国家，如何能听？道理即在于此。

因此，我们要与教宗断绝政治上的关系，同时，也要断绝经济上的联系，因为接受经济是有条件的。你要他的钱，他一定叫你背叛祖国，否则是不给钱的。现在我们的经济本来可以独立，就应当与教廷断绝在经济方面的关系。

教宗的通谕，有三种方式，一、是纯教义问题的通谕，二、是以

宗教形式达到政治目的的通谕，三、是以政治形式达到宗教目的的通谕。我们对于第一种通谕，百分之百地服从，后二者均得考虑、分析。

我们分析的方法有三种：一、本质；二、方法；三、目的。比如一个通谕来了，我们必须探究这通谕的实质是什么，再进一步追求他用的是什么方法，最后要达到甚么目的。这个分析方法好比三把钥匙，不论来了甚么形式的通谕，只用投簧的钥匙一开就开了。经过我们的分析，认为是政治问题的，决不服从，如果是宗教问题，而其中夹杂政治问题的，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做，并不是裂教。什么是裂教呢？比如教宗规定圣母升天是当信的道理，你不信，这就是裂教。否则就不是裂教。至于北京大会对教廷的抗议，是抗议教廷利用宗教形式达到政治目的，并不是对教义教规有什么不同意，所以根本谈不到裂教的问题。这是应该分析清楚的。

更正 上期本刊第4页右栏倒数第4行“对中国天主教”，应为“对中国主教”；25页题“宗教和苏埃维国家”，应为“宗教和苏维埃国家”。特此更正。



耶穌與人的結合

講道台

天津西開總堂神父

• 岳樹德 •

耶穌講比喻說：“天国如同一个国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婚筵，……”（瑪豆，22章，1—14节）为儿子摆设婚筵的国王，就是全能、全知、全美善的天主圣父，造天地、造神人、造万物的大主宰；儿子就是天主第二位圣子——我們的救世主耶穌。这个婚筵是表明天主第二位圣子降生到世上，同我們交友，同我們每个灵魂結合成亲。这种福分又是如何地大呀！这种結合，在領洗时开始，在領圣体时亲密，在天堂上完成。

耶穌在領洗時與人開始結合

因为人有原罪，灵魂上没有天主的圣寵，沒有超性的神恩，是天主的仇敌。但是爱我們的耶穌，为我們立了圣洗圣事，用这件圣事，把人从罪惡中救出来，洗淨灵魂的污穢，賦給灵魂天主的圣寵及天主的神恩，并給我們穿上华美的礼

服，引我們到天主圣父面前。天主圣父降福我們，爱我們，接納我們如同自己的儿女一样；如同圣子的淨配、天上的繼承人一样。

因着圣洗圣事，我們的灵魂已經正式許与天上的淨夫，結成終身盟約，永矢弗譖。这是多大的榮幸，多大的福分，多么稠密的結合！圣女依搦斯致命的时候，很高兴地对左右的人說：“我許配給天神侍奉的。”圣女这句话把她内心的快乐完全表达出来了。有良心的人，該如何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地忠信侍奉耶穌，用心保守領洗时所穿的天主圣寵的洁白华服！一定小心，不弄污它；一定尽力效法吾主耶穌。一定在一切的事上專心求耶穌的喜欢悅乐。“我只忠于祂一人，我誠心全身交于祂。”对耶穌的莫大恩惠，理当如此。但是在耶穌的門徒中有多少有眼无珠、不知好歹的人！他們甘心情願作魔鬼

的奴才，作地獄的柴火；甘心情願背盟棄約，把淨夫所賜的吉服禮袍弄得污穢不堪。他們不尋求耶穌的喜樂，專心滿足自己肉身的要求，無惡不作。耶穌不喜歡的，他們偏要去作；耶穌喜歡的，他們却一點不作。這是多么沒良心，多么叫耶穌傷心！

在領聖體時，耶穌與人親密結合

我們的靈魂，屢次對我們的淨夫——耶穌不忠信，犯罪得罪祂，將靈魂洁白的長袍，弄得污穢不堪，幸而極聖善的耶穌担待我們，不願拋棄我們，還滿心懷愛我們，設法提醒我們認識自己的罪過，幫助回頭自新。只要我們真心悔改，他就再賦聖寵，再把洁白的長袍給我們穿上。“快把那最好的長袍，給他穿上。”不但如此，因為他仁愛無涯，還要請我們享祂天神之筵。為了更鞏固，更親密地同我們的靈魂結合，祂用自己的全能，立了奇妙的聖體聖事。借着聖體同我們親密的結合成一個“祂在我，我在祂”，我們每次領聖體都是這樣。祂以寵愛充滿我們的靈魂，以祂的神恩裝飾我們的靈魂，用祂的

聖德聖化我們。聖基所說：“我們成了一身一靈。”聖保祿說的更妙：“活已不是我了，而是基督活於我。”這是多么大的福氣！我們應該如何聚精會神地尋求這種結合！我們的淨夫——耶穌，這樣滿懷愛心地召請我們，一再地渴求同我們親密地結合。但是，竟然有許多人拒絕耶穌，不敢接待耶穌。有的人就是接待，也不過是淡然漠然。有的人甚至恩將仇報，冒領耶穌的聖體。這多么兇狠呀！若是子女將自己的慈父交給強盜，因而遭受殺害，對這樣的子女，人們將要說他什麼呢？冒領聖體的罪惡不比這更厲害嗎？這樣的人比釘死救世主的人還要可恨。這樣的人，太沒良心！

耶穌在天堂上與人永遠結合

以上說了領洗時的結合和領聖體時的結合，這兩種結合已經就表現了天主對人的無限的愛，然而耶穌還嫌不夠，還願意將來在天堂上同我們永遠的結合，永不分離。若是我們在世上完全遵守天主的誠命，用心保守好禮服的潔白，專心尋求天上淨夫的喜悅，為祂增加光榮讚美，侍奉恭敬祂的子女，就是

多修德立功，常发信、圣、爱三德，事事符合主旨，那么，耶稣在天上一定要重重地报答我们，同我们永远结合，永不分离，赏我们天上永福，天上的光荣，赏我们永远享见天主的本性本体。圣经上说：“我们同祂相似”，“我们若是同祂受苦，将同祂受光荣。”

我们应当常常想着这荣福的花冠，常常记住耶稣许给忠心侍奉祂的人的酬报。圣保禄宗徒说：“为我保留公义的花冠，这是公道的判定，到那一天，要赏赐你们的。”

为这亲密的结合，我们应当大大地感谢天主，大发爱慕救世主——耶稣的心情和行动，因为他竟屈尊就卑，同我们卑污的灵魂结这神亲。我们该当忠实地侍奉他，该躲避一切使吾主耶稣心痛难过的事，事事但求吾主耶稣悦乐喜欢。“凡祂悦乐的，我都奉行。”我们该常发爱情，善领圣体，并盼望早升天享见吾主耶稣，同祂永远结合。我们又该不断地求仁慈的圣母玛利亚，相帮我们得着这个永远结合的大恩。

幸福之家

保定市西大园社第三生产队的教友连洛贺，解放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从13岁上就给地主当长工。在旧社会漫长的岁月里，终年过着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农民逐渐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连洛贺的一家翻了身，开始过起美满、幸福的好日子来。

连洛贺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身强力壮的生产能手。他们在入社短短一、二年中就大大改变了未入社以前的样子。去年已由一个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又盖了三间新房子，置备了一些新家俱；近来又买了一辆自行车。连洛贺常说：“没有共产党来领导，哪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朱凤林）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 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湖南省傳達會議進入討論階段

絕大多數神長擁護大會決議及對羅馬教廷抗議

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湖南省傳達會議，于10月21日在長沙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來自全省9個教區的神職人員、愛國會工作人員、修士、修女和教友共69人，代表性很廣泛。

會議首先學習和討論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繼于23日由常德教區楊高堅代主教傳達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關於“中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情況和今後任務”的報告。接着，由長沙教區屈天錫代主教傳達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章程”及其說明。常德教區熊德薄付主教和長沙市天主教友愛國會肖鴻才主任委員又分別傳達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和對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區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抗議。

會議根據以上幾個傳達報告，
到11月6日為止，已進行10天的小組座談和聯組討論。重着談的有愛國會的性質和成立愛國會是否要羅馬教廷批准，中國教會與羅馬教廷的關係以及中國天主教會獨立、自主、自辦等問題。在討論中，發言踴躍，做到了各抒己見，暢所欲言。

關於愛國會的性質和成立愛國會是否要羅馬教廷批准的問題，大家認為，愛國會是團結神職人員和教友開展反帝愛國運動、積極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保衛全界和平的政治性群眾團體，它不屬於教會體系，用不着羅馬教廷批准，羅

馬教廷完全無權過問。李斯德神父說：“愛國會要不要羅馬教廷批准，實質上就是中國人民愛自己的祖國要不要羅馬教廷批准的問題。難道做一個天主教廷，連神聖的愛國權利和義務都沒有了嗎？說愛國會要羅馬教廷批准，這是完全喪失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和氣節。”

在談到中國教會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時，大家討論得更為熱烈。王子澄神父引証了不少歷史事實，來說明羅馬教廷是怎樣被帝國主義利用作為侵略工具的。李毅神父也從歷史上羅馬教廷與德、意、日、法西斯的親密關係等，說明羅馬教廷在政治上是一貫維護最反動的政權，一貫反共、反蘇、反人民民主國家的。嚴香柏神父更就他在美國讀書時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實，有力地揭露了羅馬教廷自二次世界大戰後，是怎樣緊密地追隨美帝國主義，並忠實地為它的擴張政策服務。羅社、郭第秀等教友還從羅馬教廷的經濟來源上揭示了它與美帝國主義的主從關係。這使大家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天主教同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是牽涉到兩個根本對立的政治立場問題。羅馬教廷是

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目前美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控制着羅馬教廷，利用羅馬教廷為它的侵略政策服務。因此，中國天主教必須堅決與羅馬教廷割斷一切政治、經濟關係；在宗教方面，也只能在當信當行的教規教義上與它保持純宗教關係。

關於中國教會的獨立、自主、自辦問題，楊高堅代主教強調指出：“我們的祖國是一個偉大的獨立國家，而我們的天主教會卻還處在被帝國主義控制的半殖民地狀態，這是很不相稱的。必須發揚民族自尊心，徹底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依靠中國教友自己的力量來办好教會。”楊代主教的話表達了絕大多數神職人員和教友們的願望。屈天錫代主教也用具體事實說明中國教會必須獨立自主自辦。他指出，因組織破壞活動而被我國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又被梵蒂岡派作了駐台灣“公使”。他說：“對這件事我經過了鄭重的考慮，我如果無條件服從教宗，那就是承認蔣介石政權是合法的，承認美帝國主義侵略台灣是合法的。因此，在政治上我們是不能接受羅馬教廷指示的；在經濟方面也是一

样，我們要做到独立自主。”屈代主教还提到教务方面也要独立自主。他說，我最初对这点是有顧慮的，經過考虑，認為中国圣統制确立了多年，誰知中国20个总主教，中国人却只有3个。为什么硬要外国人来当主教呢？这是因为中国教会受着帝国主义的控制。宝仁（帝国主义分子）被驅逐出境前，曾对我說：“請你接办丽文中学”。接着又說：“到平安的时候还是外国神父来办好些。”此外，外国人对于培养中国神职人員也表现了他們想长期統治中国教会的意圖。例如

藍澤民（帝国主义分子）曾对我說：“我們需要培养的是下乡傳教的神父，而不是有才能可办大事的人。”这就說明了他們要的只是可供他們使喚的奴才而已。

也有极少数人对以上問題还有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羅馬教廷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羅馬教廷的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是为了維護教会利益；中国天主教友成立自己的爱国組織——爱国会，要經過羅馬教廷批准；等等。

为了进一步辨明是非，會議正在深入討論。（肖鴻才）

廣州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委會進行傳達 會上並揭發鄧以明的反動事實

广州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委会于11月3日举行了全体筹委（扩大）會議。到会的有60人。會議首先听取了出席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广州代表陈志雄教友的关于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傳達，接着分組进行討論。在討論中，大家一致認為：几年来的爱国运动是有很大成績的；中国天主教会必須与羅馬教廷割断政治上、經濟上的关系，中国天主教会不但應該而且完全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独立自办。与会教友并紛紛揭发广州教区主教鄧以明几年来阻撓、打击、破坏广州教友反帝爱国运动的事实，并指出：广州教区领导人必須“浪子回

头”，与全国神长、教友一起，与祖国人民一起，走反帝爱国的道路才是正途；不然，就是自絕于人民，是广大教友所不允許的，全国人民也是决不允許的。

會議通过一項決議。決議指出：要在广州天主教內开展社会主义学习运动，使全体神长、教友都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改变广州天主教会目前与祖国面貌不相称的局面，高高地將反帝爱国旗帜举起来。

最后，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方安处长应邀到会講話。（陈方）

各地傳達簡訊

貴州省 貴州省三个教区的神职人員、修士、修女和教友共 188 人，在政府的领导下，于 10 月 7 日至 11 月 2 日举行了座談会。在会上，听取和討論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精神和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对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抗議。

当全体与会人士听到了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区合法选举的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时候，对羅馬教廷这一无理干涉和非法措施，表示无比的憤慨，并坚决拥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对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抗議。

大家指出：羅馬教廷对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无理否認，不仅关系到上海一个教区的問題，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国天主教会爭取独立自办的問題。上海教区依法选举張士琅为代理主教既合乎

圣教法典規定，又合乎教区利益，羅馬教廷无理剝夺上海教区合法权利的命令是錯誤的、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黃明亮）

宣化 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鎮宗教事务科于 10 月 31 日召开了天主教教友学习組組长座談会。會議听取了有关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傳達，然后进行漫談。与会者在漫談中一致認為：反帝爱国是每个教友的神圣职责；中国天主教会与羅馬教廷割断政治、經濟关系，完全是正义的爱国爱教实际行动，并不是叛教，他們表示：羅馬教廷企圖用所謂“絕罰”、“裂教”等等来破坏我們的爱国运动，我們絕不能接受的，同时，我們还要警惕今后，教廷的破坏活动。（溫哲生）

保定市 为了貫徹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和決議，保定市天主教友学习組織于 9 月 23 日举行會議。会上由出席代表會議的代表王其威神父和侯鴻裕教友傳達了會議的精神和決議。会后大家进行了討論。（朱鳳林）

濟南獻縣等地神長積極參加抗旱勞動

正当济南市全体人民热烈展开抗旱运动的时候，济南市的神长們，在董文隆代理主教的带动下，积极地响应了政府抗旱的号召，先后四次参加了抗旱劳动。在抗旱劳动中，神长們表现的非常积极。董文隆代理主教澆了一天麦子，累的全身发疼，但总沒有說过一句怨言，坚持了抗旱劳动。神长們表现的高度的劳动热情，受到了抗旱群众的一致表揚。（孙兆文）

河北省献县地区，去年山洪氾濫，水災严重，顆粒不收；今年旱魃为虐，乾涸異常。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自从北京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胜利成功回到献县后，就传达了大会的主要精神，进一步地提高了全堂神父修士修女們的爱国热情；所以抗旱工作一佈置下来，都精神很飽滿地准备了抗旱工具，就于8月23日上午7时，整队出发，开始工作。

这次参加抗旱的神父修士20人，修女們24人。男女兩組共44人。神父修士修女們看見赵振声主教亲身带头工作，都大大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10时左右，献县宗教事务科的李清連科长听说天主堂开始抗旱，就馬上赶到工作地，从一位幼弱的修道生手中要过水担子去，就扭开了水。9亩半多的玉米，原来計劃兩天澆完。水坑与玉米地的道路是轉灣回折的，相隔約半里多地远，然而他們提前一天就完成了任务。第二天又有县宗教事务科的王新志同志和省里的刁健同志的帮忙，又提前一天完成了西园內的10亩地的抗旱工作。

劳动時間与休息時間，大家都是說說笑笑。修道生們不时地哼唱着一二个小圣歌，情緒很高漲。（張駿声）

“四十年通牒”的反動政治本質

• 姚 溥 •

羅馬教廷 的反動 政治面目

翻开教会历史便可看到，除了在宗徒时代和其后短短数百年的期間外，历代教宗莫不或多或少地参与政治活动，时常利用他們的宗教权威进行政治活动。在奴隶社会时代，他們拥护奴隶制，在其末期并曾反对新兴的封建主义制度；在封建主义在政治上获得了統治地位以后，他們又掉轉头来拥护封建主义，反对在这一时代末期兴起的資本主义来了。及至資本主义制度巩固以后，他們便不遺余力地拥护起資本主义制度，直到今天，还在千方百計地为即将灭亡的資本主义制度撑腰打气，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从比約9世起一直到比約12世止，莫不如此。

近百年来，教宗拥护資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发表公开的政治性言論，有时則利用宗教的形式（如頒发通牒等）进行这种反动的政治活动。有的人不相信这一点，認為羅馬教廷不会利用宗教形式进行政治陰謀活动，那么我們便举出教宗比約11世在1931年5月15日所頒发的“四十年通牒”（Quadragesimo Anno）为例子。这个以紀念良13世頒发“新事故通牒”（Rerum Novarum，又名“劳工通牒”）40周年而頒发的反动的政治性文件，就其形式来說，是对普天下圣教会神职界的宗教性的指示；但就其內容来分析，則絲毫沒有任何宗教性在，所有的都是在宗教性詞句掩盖下反苏、反共，散布极为反动的“階級調和論”，用以抵制共产主义运动，在虛伪地“譴責”壟断資本主义的掩盖下贩卖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理論的反动政治宣傳。从这个“通牒”里，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教宗是如何地慣于利用宗教形式贩卖政治上的私貨，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羅馬教廷在关怀工人利益的美名下为工人階級的敌人資產階級服务，効忠于資本主义制度，

公开为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作宣傳。

“四十年通牒”，在其基本原則上，是繼承了良13世在“新事故通牒”中所揭櫫的反对无产階級革命的反动傳統的；但在具体“方案”上，則因为时代的进展，比“新事故通牒”又进了一步。也正是因为时代的进展，換句話說，正因为从“新事故通牒”問世时（1891）起到1931年为止这40年間，世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和苏联建国后的日益巩固，同时則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帶給資本主义世界的暫时的繁荣的破产和自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以及各国劳动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偉大胜利的鼓舞下所进行的經濟上与政治上的階級斗争，遂使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面貌愈益暴露，公开誣蔑苏联和共产党。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反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論的問題，而完全是从政治經濟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比約11世効忠于資本主义制度的突出表現，就是在“四十年通牒”中拚命地宣揚所謂“階級調和論”来对抗国际工人运动，削弱工人階級反对資本家剝削的斗争。首先，他不惜歪曲教义，把資本家与工人

的同时存在說成是天經地义、不可动摇的事，亦即所謂“資本不能离开劳动，劳动也不能离开資本”的“自然律”或“正常的秩序”。任何稍懂一些教义的人都知道，天主造天地万物时，并没有規定这样的“自然律”和“正常的秩序”；在資本主义社会出現以前那些悠久的年月里，也根本没有資本家。正相反，天主却曾对原祖亞当說过，“你必须劳动流汗，才能吃飯。”在聖經中从来也没有記載过維護資本主义制度的甚么“正常的秩序”。

其次，为了緩和階級斗争，比約11世又象今天中国工商界中某些右派分子一样，把資本家也硬說成是劳动者，好象資本家不是在从工人的劳动果实中榨取“利潤”，他們的收入好象是另有来源似的。他說：“普遍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没有全体国民，包括雇主和被雇者，的不断的劳动，没有一个国家会从貧穷与匱乏之中升到富裕的境地。”就这样輕輕的一笔，便把資本家（雇主）与劳动者（被雇者）摆在一个立場上了。經上說：“富人进天国比駱駝穿过針眼还困难”，而比約11世完全原宥了沾滿腥臭的資本家。很明显，这样歪曲事实的

說法，其目的只能是使人們相信資本家不是剝削者，而是勞動者，從而肯定了資本家的合法存在，也就是肯定了剝削制度的合法存在，因此，共產主義運動所主張的徹底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在比約11世的眼中，便成了“工人方面的過分要求了”。

不能不指出，“四十年通牒”中雖有一些“譴責”壟斷資本主義的詞句，但其真正的企圖卻完全不是真正地反對壟斷資本主義，而正是在反對壟斷資本主義的幌子下為壟斷資本主義服務，向替壟斷資本家服務的法西斯主義喝采。這種企圖，在“通牒”的98—100三節中表現得最為露骨。在這三節里，比約11世擁護和贊揚了當時法西斯意大利所實行的“組合國家”或“合作國家”的反動制度。這種制度，表面上是為了調節資本家與工人雙方的利益，實際上則是幫助資本家來殘酷地剝削工人，並利用國家的權力強制禁止工人罷工的制度。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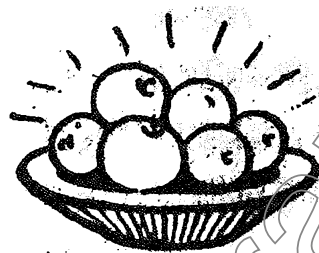
於這樣一種極為反動的制度，比約11世卻贊不絕口地稱頌說，它的“優點，可以不必多加思考地就看得出來”；無怪乎他在另外一個場合要稱贊這種制度的創始者、法西斯始祖墨索里尼為“賢明無比的首相”了。

“四十年通牒”的反動本質，約如上述。通過這個“通牒”，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比約11世，是利用了宗教的形式進行了反動的政治宣傳的。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是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面目的最好的說明。同時，對於那些天真地認為教廷或教宗不會通過宗教形式進行政治活動的人，這個事實應該使他們有所憬悟，從而認識到不久以前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所作出的決議中有關中國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的關係部分，以及會議對羅馬教廷利用宗教形式破壞中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的抗議的正確性與重要性。

“現在，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障礙，為人類沒有絲毫的貢獻，是失業、貧窮、剝削、壓迫的總根源。處於現在的環境，聖教會應該全力支持締造現世的美滿生活而走向社會主義的人。”

——摘自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神職班全國和平會議“告全世界神職班書。”

金蘋果



一句話說得適宜，就如銀盤中的金蘋果。——箴言：XXV 11。

真是不了解情况嗎

·夏 湘·

有人时常以教廷“不了解情况”为詞，为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活动作辯护。教廷无理“絕罰”爱国神长，是教廷受了被驅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蒙蔽；教廷不准中国教友拥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也有人說了：这是因为教廷不知道新中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如此。

当真是不了解情况嗎？我看未必，如果教廷真是閉目塞听、昏聩糊涂，那末，羅馬費特通訊社（別忘了它是教廷的机关通訊社）对于中国神长教友筹备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又为什么知道得那末清楚呢？不但今年2月間在北京举行的扩大会議的参加人数，它是瞭若指掌；即連会后报纸未发表这项新聞，它也是知道的。同时并在这上面大作其反共、反爱国运动的文

章，企圖混淆視听。这难道是不了解情况嗎？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在解放之初即載在共同綱領，后来又明文載在宪法。政府首长有关这方面的談話很多，这些都載在中外报纸。同时，有許多外国来宾到中国参观后，回去写文章、发表感想，也多次提到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情况。如果教廷真是願意了解情况，难道不能从这些文字和記載中窺知事实的真象嗎？然而不然，它不这样做。这真应了中国古書上的一句話：“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我看教廷不是不了解，正相反，是了解得很清楚。唯其了解李維光、李蔭桃等爱国神长是爱国的，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所以才“絕罰”；唯其了解新中國

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深知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得到中国神长教友的拥护，它才尽情诬蔑，颠倒黑白，甚至威胁恫吓，无所不用其极。

那末，也许有人要问：既然教廷了解情况，为什么还要不许我们爱国，不许我们拥护共产党呢？这道理其实很简单。它深恐中国神长教友爱了国、拥护了共产党，就必然要反对帝国主义，尤其要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破坏中国，也就是违了它的反动政治路线，所以才坚决不许，并利用各种形式来加以阻挠也。

人们皆知过去在中国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惯于使用“愚民政策”，殊不知这“愚民政策”的根源不在别处，正在罗马教廷。

君子可欺以其方

· 志 龢 ·

中国古书上有句话：“君子可欺以其方。”意思是说，对老实人可以利用他的老实来骗他。

许多善良的教友是很老实的，老实到认为教宗就是“活天主”，帝国主义分子都是“活圣人”。“活天主”和“活圣人”怎能干坏

事？于是有时就上了当，吃了老实的亏。

帝国主义者看到善良的教友们的老实，正是“可欺以其方”的“方”，所以一再使用使人迷惑的字句来掩盖他们的毒药：“你们反对共产党吧，因为共产党是无神主义者，它的‘主要目的是把灵魂中连神的观念一起根除’”；“为了救灵魂，‘流血致命要好得多’”（註）；等等。这是因为他们深知善良的教友们以灵魂为重，把致命看成升天堂的捷径的缘故。

事实果真如此吗？完全不是。共产党的主要目的不是什么“把灵魂中连神的观念一起根除”，而是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共产党确实保护了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何来“致命”之说？按照费特通讯社的指示去“流血致命”，非但升不了天堂，反而是犯了天主十诫的第四诫，犯了大罪。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君子”固然不是坏事，可是不能不提高警惕，以致被人“欺以其方”还不自觉。

註：单引号所有字句具见“费特通讯社”5月18日及7月13日的电讯中。

各地 簡訊



揚州神長教友座談對 十月革命的認識

为了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揚州市政协宗教工作組，特于10月29日下午2时在政协会議室召开了工作組扩大座談会，天主教方面共有神父教友十几个人参加。会上发言者很为踊跃。大家除了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国际意义、苏联40年来的偉大成就，以及对我国无私的援助等交換意見外，更就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才能真正的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发表了感想。大家談到：在帝俄时代政教合一，强迫人民信仰宗教，那里談得到“自由”二字；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苏維埃頒布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人民能够真正地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大家也談到，我国解放以后，教会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不再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侵略的工具，广大的教友

們过着真正宗教信仰自由的愉快生活，这种自由幸福与十月革命胜利也是分不开的。大家一致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断地向苏联学习，特别是要学习它艰苦奋斗、勤儉建国的精神，来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国。（吳士菊）

武漢塗世華神父報告 訪蘇觀感

为了庆祝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武汉市宗教界于11月8日上午在中南劇場举行大会，天主教神長、修士、修道教友400余人出席了大会。

會議由出席第6屆青年联欢节的中国代表团团员、天主教兩湖神哲学院付院长涂世华神父作訪問苏联的报告。涂神父在报告中說：十月革命成功后，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把苏联建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苏联的工业，农业、科学、文教、卫生事业都收得巨大的成就，这充分說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今天苏联人民是最幸福的人民。他們建設的成就是經過艰难困苦得来的，我們向学习苏联，建設我們的祖国。苏联的

今天是我们明天的明天，我们要加强中苏友谊。保卫世界和平。会后放映苏联电影“革命的前奏”。

(刘国政)

爲十月革命献彌撒一台

为了庆祝十月社会主义四十周年，河南省漯河市刘亞敬神父在10月3日特献彌撒圣祭一台，祈求天主降福世界和平的堡壘——苏联，为人类創造更好的幸福，领导全世界人民共同走向和平的道路。

彌撒前，刘神父詳細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偉大历史意义，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設方面的偉大成就和在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上的偉大貢獻。他并号召教友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反对右派分子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謔言。

(陈心謙)

山東省召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

山东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預备會議于10月28日開幕。參加會議的

代表計有济南、青島、兗州、临清、益都、周村、烟台、濰縣、陽谷、威海、临沂等11个教区的監牧主教、代理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教友代表150余人。計劃在預备會議后，繼續召开正式會議，最后成立山东省天主教友爱国会。

(孙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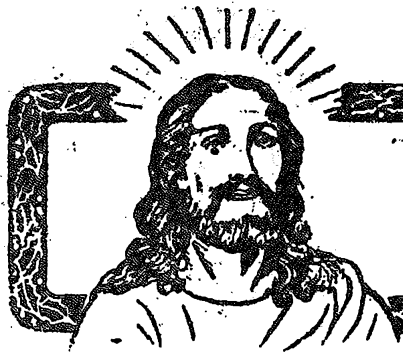
武漢神長教友熱烈救災

武汉市礄口区宗关街，于10月16日不幸失火，受災居民百余戶，我天主教友受災7戶20余人。当火災发生后第2日，武汉市爱国会礄口区分会刘国政主委、水厂天主堂本堂神父高丁乙等分別前往慰問，兩湖神哲学院神长修士及宗关街教友捐贈衣服47件及帽子、鞋、袜、等甚多，分別贈送受災教友。礄口区人民委员会对受災居民教友等，及时予以安置，并發給寒衣及救濟物資等。受災教友对人民政府和爱国会及神长修士教友及各方面人士的关怀，深表感謝。

各地通訊員及讀者諸君：

本刊本年最末一期，擬在聖誕占礼前（約在12月20日左右）出版，准备以相当篇幅刊载各地神长教友热烈筹备庆賀聖誕占礼的情况。請將各地（尤其农村）筹备情况及占礼前的宗教生活等消息，提前于12月10日以前寄到編輯部，远地請尽量利用航空信邮寄。占礼时情况，亦請于占礼后三日內寄出为荷。

本刊編輯部



耶穌傳

李德培神父作
(張繼插圖)

(接上期)这次鞭打，历时几何我们不得而知，所知道的只是总督的本意，在保留耶穌性命的条件下，打得越兇狠越好。据古人傳說，耶穌被惡人鞭打五千四百多下。及至解綁以后，耶穌已无力支持，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达味圣王預言耶穌受鞭打苦刑說：“惡人們重打我的肩背，如鉄匠在鉄砧上打鉄一般，以致諸骨可数”。(圣咏，貳壹，18)

耶穌受鞭打以后，殘暴的差役們重新又表演了黑落得戏耍耶穌为假王的把戏，又侮辱了耶穌一番。——按羅馬总皇的仪仗，不外紅袍、皇冠、权杖、受人叩拜。这时差役們叫耶穌仍坐在被鞭打时的石砌

上，找来一件破紅袍給耶穌披在身上，当作蟒袍；遞給耶穌一根竹竿，当作权杖；更惡作剧地用荆棘編成一个茨圈，戴在耶穌头上，当作皇冠。然后成群結夥地来在耶穌面前，屈膝叩拜并譏笑着說：“犹太王！您好呀！”并唾污其圣面，有的夺回手中的竹竿，用力敲打耶穌头上的茨冠，使荆茨更深地刺入头皮，加强耶穌圣首的痛苦。

差役和兵丁糾合起来，不下五六百人，此去彼来，丑形百怪，难以形容；狂声謾罵，极凌虐之能事。先知依撒意曾为之叹息說：“救世主从头至足，无一处不受有殘伤。”

(依撒意書，壹，6)

185 請視斯人

若望，拾玖，4——8。

头戴荆茨冠，身披破紅袍，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兩頰青腫，滿面的血跡与唾污，渾身上下血淋淋慘痛至極的耶穌，由差役們押着，隨

从比拉多步至庭外。比拉多首向众惡人宣示說：“我把这个人——耶穌帶出来，叫你們看看。我在他身上实在查不出有什么罪来。”随轉身

指着耶穌向台下說：“請視斯人！”

这时耶穌突然端立在眾人面前，血人般的慘狀，真令人目不忍睹。比拉多認為这样足能感动惡人們的心，不再堅求釘死，而达到釋放耶穌的目的。豈知鉄石般心腸的

人們，見了被苦難的耶穌，不但無動如中，反而大聲喊叫說：“釘殺他！釘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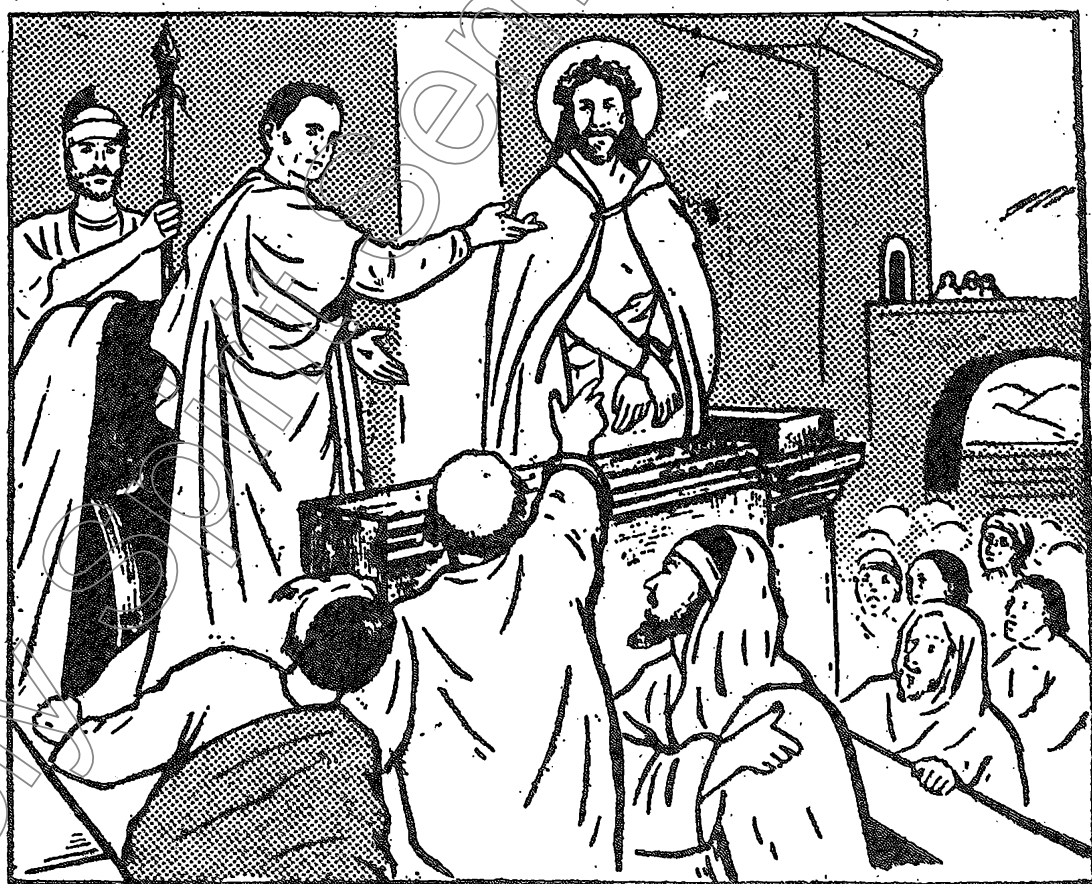
比拉多見這些人們对本族的同胞毫無憐憫之情，憤慨地說：“把他帶去，你們自己釘死吧！因为我找不出他的罪來。”比拉多說這說的用意，是在譏諷他們，因为他知道他們

沒有釘殺人的

權。
这时惡人們非常地焦躁起來，心想以前控告耶穌的一切言行，完全沒有

被总督重視，釘殺耶穌的企图，恐怕難以實現。想而又想的，只得引証犹太法律再次強調說：“我們有法律。按我們的法律，他是該死的！因他冒充天主子。”

比拉多一听到耶穌曾自称为“天主子”，心中若有所深思。他曾听说耶穌行过多少圣蹟，救过多少人的困难；并且他曾对自己說過：“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上。”这一切一切使他对耶穌产生了一种撲朔迷离、不可思議之感。究竟該怎样处理？他惘然若失地又踱入內庭，并吩咐差役們把耶穌帶回，再作审察。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侯	若	亞	敬	(64岁, 河北張北人)
李	若	瑟	瑟	(58岁, 河北張北人)
殷	黃	瑪	利亞	(55岁, 河北張北人)
高	瑪	利	亞	(55岁, 河北任邱人)
張	若	望	望	(72岁, 河北南皮人)
王	小	德	肋	(21岁, 天津人)
盛	若	望	望	(33岁, 天津人)

周 年

周 達 尼 老
董 類 思
徐 若 瑟

周 亞 加 大
柯 加 大 利 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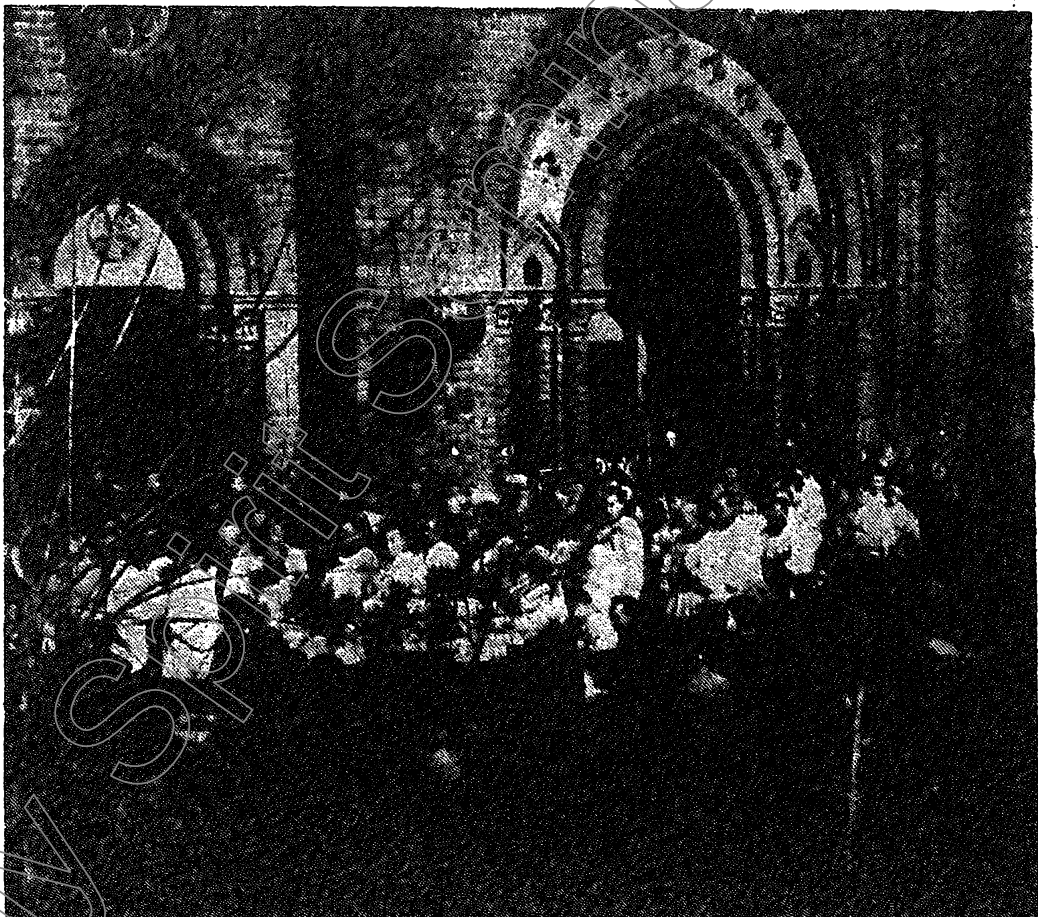
請 衆 僑 友

爲 彼 祈 求

皮總主教爲熱河教區祝聖兩神父

本年10月20日，在沈陽南關總堂由皮漱石總主教祝聖熱河教區張永慧、師若水二位司鐸。典禮由午前9時開始，至11時30分結束。參加典禮的有1200餘人。典禮非常隆重而莊嚴，大家感到特別興奮。這是該教區十餘年未有的大喜事，也是人民政府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具體表現。與會者都異口同音地說：感謝黨和人民政府，今後願以實際行動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響應祖國的一切號召，爲搞好愛國愛教專業而共同努力。

（肇博顯）



祝聖典禮後出堂時攝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